

高原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述评

赵靖 孙昭亮

内容摘要：2019年10月，由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和西藏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高原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成都召开。来自中外学术机构的70余位藏学界、考古学界和艺术史学界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其中39位学者作了大会发言，分享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另有20名研究生代表在晚上的青年学术论坛发表了演讲。在为期两天的研讨期间，与会学者围绕高原丝绸之路考古与文献证据、唐蕃古道及其沿线历史、考古与艺术的研究、明清时期的西藏历史研究、藏文文献的新发现及其研究、佛经的汉藏翻译与汉·藏·印文化艺术交流等多个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此次会议是校际间学术交流方式的一次有效探索，不仅为汉藏历史文化交流，促进中外、内地与西藏之间的学术交流搭建了学术平台，也推动了高原丝绸之路的相关研究向纵深发展。

2019年10月19日至20日，由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和西藏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高原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成都召开。此次会议由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西藏大学特聘教授巴桑旺堆研究员，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教授和西藏大学文学院院长桑木旦教授共同召集。来自西藏大学、四川大学、西藏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兰州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河南大学、青海民族大学、中

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故宫博物院、敦煌研究院、美国哈佛大学、弗吉尼亚大学、阿帕拉契州立大学、纽约喜马拉雅艺术资源中心等中外学术机构的 70 余位藏学界、考古学界和艺术史学界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其中 39 位学者作了大会发言，另有 20 名研究生代表在晚上的青年学术论坛发表了演讲。

在由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所长石硕教授主持的会议开幕式上，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杰出教授霍巍先生和西藏大学文学院院长桑木旦教授分别作了大会发言，就“高原丝绸之路”的学术概念、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互动、和平合作、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绸之路精神的形成以及在“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下，就高原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展开深入研讨的学术意义进行了阐述。在接下来为期两天的会议研讨期间，与会学者围绕高原丝绸之路的考古与文献证据、唐蕃古道及其沿线历史、考古与艺术的研究、明清时期藏地的历史研究、藏文文献的新发现及其研究、佛经的汉藏翻译与汉·藏·印文化艺术交流等多个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一、高原丝绸之路考古与文献证据

“高原丝绸之路”是指通过青藏高原的东方与西方、中国与外域交流的交通网络及其主要干线¹。对于这条道路联通的时间、范围和内涵，学者们以考古和文献材料进行了双重论证。四川大学吕红亮教授以现有青藏高原地区出土的前吐蕃时期小米、小麦、大麦、丝绸、茶叶、陶罐、珠饰等出土物，结合周边地区的相关考古发现为高原丝绸之路举证其史前证据，指出考古学的研究表明，至少从公元前 1500 年开始，青藏高原就和外界发生广泛联系，形成了多条对外联通的通道，并且范围逐步扩大，丝绸之路不只是一条路，实际上是一个旧大陆的网络，是物质交流的线路。四川大学的杨锋博士和李帅博士分别介绍了最新在西藏阿里和蕃尼古道的考古发现，用大量文物遗存阐释西藏西部早期交通路线的形成、与周边地区文明交流与联系的程度，诠释了高原丝路既是物质也是文化交流通道的丰富内涵。西藏大学特聘教授、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巴桑旺堆研究员依据大量藏文文献中有关五世噶玛巴、五世达赖喇嘛、六世班禅喇嘛等高僧进京路线的记载，结合汉藏通道沿途的相关民间传说、石刻造像与题记等考古材料，对历史上的唐蕃古道、元明清时期的汉藏通道的走向分别进行了清晰梳理。四川大学张延清副教授和故宫博物院张长虹研究员则对藏东汉藏交界地带发现的吐蕃时期古

1 霍巍：《“高原丝绸之路”的形成、发展及其历史意义》，《社会科学家》2017（11）：19。

藏文石刻题记《普贤行愿经》和大日如来造像等具体实物遗存的内容与形制进行详细考察,探讨藏传佛教艺术和经典受到汉地影响后的融合与变通,进一步指出汉藏文明在这一汉藏交界地带之间相互影响与吸纳,从而得到新的建构。兰州大学的方艺文宣读了她与导师宗喀教授合作考察发现的巴尔蒂斯卡多地区曼达尔佛岩上刻的一组石刻造像和题记,对部分题记进行了重新识别与释读,对造像的艺术风格进行了分析,认为这组石刻应是吐蕃势力达到这一地区后所留下来的遗存。西藏大学的南小民教授着重分析“吐蕃”一词的由来、其与“吐谷浑”千丝万缕的联系,说明“唐蕃古道”所发挥的历史文化价值。

二、唐蕃古道及其沿线历史与文化的研究

高原丝绸之路的重要功能之一是经贸往来、物品互通。兰州大学宗喀·漾正冈布教授以这条通道上流通的商品为着眼点,指出黄金、盐(“戎盐”)、麝香、大黄、藏红花是中古和近古时代青藏高原原著民与其周边世界贸易的知名商品,并着重以藏红花(saffron)为例,指出其产地并非高原却是高原上重要的中转商品,认为20世纪以前存在着一条将青藏高原与其余欧亚大陆联通在一起的通道,因此也常被为“藏红花之路”(Saffron Road)或“麝香之路”(Road of Musk)。四川大学陈波教授则从人类学的角度,实地考察了喜马拉雅地带南北向的山谷,指出差不多每一条这样的山谷就是一条贸易通道,而由于山谷里的居民都或多或少地参与到贸易当中,这些通道早已存在,使得语言、货币、风习、信仰等随着物质的大规模流动而流动,并随季节而有不同节律。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李健副研究员分析了青藏高原交通网络中拥有良好区位优势的山南雅堆地区在历史、艺术和文物等资源上的优势,认为可以发展沟域社会经济与全域文化旅游,营造“雅堆”品牌,发展贸易,实现振兴。来自尼泊尔的古隆(Tek Bahadur Gurung)博士则考察了古汉藏通道上的尼泊尔古隆族人,结合考古材料、田野调查、生物DNA等多学科知识,分析了藏彝走廊作为一条族群迁徙的重要通道,其祖先通过这条通道来源于北部,是藏缅族群的一个分支,为这一提法提供了更多的证据支撑。

高原丝绸之路作为通道被学者们广泛关注之外,围绕这一通道而产生的社会文化现象的诸多方面也受到大量关注。四川大学朱娅玲博士从近代西方人对西藏东部交通的记叙中,梳理了以这条通道为生的主要群体:水陆交通运输从业者特别是苦力、乌拉群体以及土匪的生活的各个层面的描述,丰富了有关高原丝绸之路研究的视角。来自美国阿帕拉契州立大学的李皓同博士(Scott Relyea)探索了二十世纪之交汉藏边界观念的演变,

康区如何从“一片蛮荒之地一去穿过而已”不受重视到引起重视,以及观念的变化对当地居住者带来的影响。西藏大学的更尔易西副研究员通过考察嘉绒墨尔多神山及其周边的文化,探讨神山作为固定信仰和地域保护神逐渐演变为集宗教力量、神灵居所为一体以及神圣与世俗接触融合的过程,折射出当地宗教制度、地缘组织和地方社会等文化特征。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刘鹏副院长则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指出高原丝绸之路自吐蕃以来就发挥着传递藏传佛教及其文化元素的重要作用,同时在“一带一路”倡议平台下,该通道又为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机遇。

三、藏文文献的新发现及其研究

近年来新的藏文文献不断被发现、被公布,并引起新的研究热点,传统的文献研究也不断被发掘出新的研究命题。西藏大学西热桑布教授就从新发现的上海梵宫所藏的文献来探讨广受关注的贡塘王朝。哈佛大学的范德康教授(Leonard W.J. van der Kuijp)利用新出版的阿拉善·阿旺丹达(A la sha Ngag dbang bstan dar, 1759-1840年8月1日以后)全集,以其相对较短的篇章而闻名的对《声明》(*sgra'i rig gnas*)的评注着手,注意到作者主要对货币、度量衡和实用事物等有很深的研究,于是通过对其一些汉文单词的翻译和解读为例,从中管窥当时藏人对于汉文化的理解和认知。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唐安竺(Andrew S. Taylor)分析了蒋贡康楚('Jam mgon kong sprul blo gros mtha' yas, 1813-1899年)《知识宝藏》(*shes bya kun khyab mdzod*)和《口诀藏》(*gdams ngag mdzod*)中“利美”一词的用法之后,认为蒋贡康楚提到其用法时多出现在大圆满(rdzogs chen)教法的语境中,与“无宗派”(ris med)的定义存在很大区别,实际上他是用“利美”来暗地提高宁玛派和噶举派的地位,并非是真的诸宗平等。西藏大学的罗布教授从罕都叛教问题出发,考察了清初西南边疆吴三桂势力、达赖喇嘛势力、蒙古势力等多重力量相互之间的博弈。四川大学的李志英博士利用文献资料专门研究了和硕特蒙古在康区的差税征收情况,指出青海和硕特蒙古对康区近80年(1640-1723年)的控制和经营主要建立在赋税基础之上,而征税制度是在其征服白利土司的过程中得以建立。四川大学熊文彬教授考察了司徒这一名称从职官到转世活佛系统的名号,自西周至元、明两代,经历了从实职到加官、赠官的演变。指出至元代,中央政府开始将司徒用于藏地首领的封授,封授对象不分僧、俗,但均是握有实权和影响力较大的人物。明代在这一传统基础上,又逐渐将司徒用于藏传佛教转世活佛系统的名号,并沿用至今。四川大学玉珠措姆教授研究了贡塘公主曲吉准玛传记,从中聚焦其与被称为“佩戴羊毛头

巾者”的苯教徒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的段落，指出这些描述如何将曲吉准玛塑造成一位佛教英雄的同时，也是从他者的角度对“苯教徒”这一观念进行建构。来自河南大学的齐德舜教授则探讨了宋代笔记中的吐蕃史料的重要性，认为其不仅文献数量庞大、种类齐全，而且可与宋代正史资料互补互证，拓展宋代吐蕃断代史的研究空间。西藏科学院的达琼副研究员从对古藏文文献中“喀尔”一词的解析着手，从宫殿主人、名称、规模、功能等多方面进行探讨并进行分类，指出青瓦达孜宫堡的重要功能和意义。

四、佛经的汉藏翻译与汉·藏·印文化艺术交流

佛教起源于印度，然后向北传到中国内地和西藏，因此在内地和西藏的佛教文化和艺术中不乏见到汉、藏、印文化相互交融的实例。西藏大学的拉巴次旦教授从“鲁、龙、那伽”三个词汇和文化现象的比较研究，探讨了他们在三地共有的历史渊源和不同的表现。故宫博物院的张雅静研究员则对常被误认的印度文殊造像进行了详细辨识，对于正确识别汉地和西藏的文殊形像具有重要参考意义。青海民族大学的夏吾端智副教授对于早期西藏艺术中比较流行的印度绘画风格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被命名为“噶当画派”提出了质疑，认为绘画风格的命名不宜以教派来定义。美国纽约喜马拉雅艺术资源中心的杰夫·瓦特（Jeffery John Watt）主任则批评了目前“噶玛噶孜画派”被泛称的做法，认为这种以汉地青绿山水为背景放上西藏人物的做法不能笼统地称为“噶玛噶孜画派”，其不同时期的不同代表人物南喀扎西、却英多吉和司徒班钦的绘画作品都是迥然不同的，不宜以一个名词来笼统称之。中国人民大学的王传播博士通过对过街塔名称意蕴的考证，认为在汉地、藏地都有流行的这种过街塔，其名称的核心词素为“喀尼”，其最初生成时与阿闍佛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中国的佛教艺术重镇，敦煌石窟保存的藏传佛教艺术一直吸引着艺术史家的目光，敦煌研究院的刘永增研究员介绍了敦煌、榆林等地保存的西夏石窟，并对久悬未决的西夏石窟断代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西藏，自吐蕃时期起，来自梵文、汉文、于阗文等不同语种的佛经就开始陆续被译成藏文，佛经的翻译、对勘和研究是一直国际佛学界、藏学界的重要研究内容。西藏大学的普穷次仁副教授介绍了西藏大藏经的历史背景、早期甘珠尔及其目录（后弘期的手抄本和木刻本）、后期甘珠尔及其目录及国内外研究现状等；旺多教授则重点研究了佛典翻译经典之作《贤愚经》，该佛经以生动的故事和朴实的语言得到广泛流传，不仅传播了佛教思想还对西藏的政权、法律、文学艺术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北京大学的萨尔吉教授则对大乘经典著作《宝星陀罗尼经》的不同本子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该佛经

对藏传佛教仪轨有一定的影响。四川大学的罗鸿教授从德光乃再弘律藏入手探讨了《律经》，一部用典型的“非佛教文体”撰写的佛教典籍，讨论了它与根本说一切有部兴起的关系及所反映的当时当地的社会文化现象。西藏社会科学院的欧珠次仁副研究员则通过龙树的《亲友书》梵本原典与藏汉译文的比较研究，简要介绍了梵文译经中藏汉翻译的异同与经验。

为了扶持青年学子的成长，本次国际学术会议专门邀请了西藏大学、四川大学和兰州大学等高校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参加会议，拓展学术视野，提升研究水平，并在晚上开设青年学者论坛，有 20 名研究生同学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同时邀请西藏大学和四川大学的老师进行评议和指导，西藏大学桑木旦教授、四川大学霍巍教授和哈佛大学范德康教授等也亲临讲坛，聆听研究生们的报告并给出具体的指导意见，对青年学子的成长给予关心和鼓励，极大地提升了学子们的学术自信。

五、几点认识

经过两天紧张而热烈的学术研讨，会议圆满地落下了帷幕，闭幕式由西藏大学文学学院院长桑木旦教授主持，巴桑旺堆研究员作了总结发言。在为期两天的会议里，中外学者们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讨论与交流，大大丰富了对高原丝绸之路沿线历史文化的认识，加强了藏学、考古学、艺术史、民族史、佛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交流与互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结合各自研究领域，探讨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如宗喀·漾正冈布教授以贸易的主要商品藏红花、麝香等研究为着眼点对高原丝绸之路的研究、吕红亮教授列举的高原丝绸之路史前考古的实物例证、刘永增研究员对敦煌西夏石窟年代的考证、陈波教授在喜马拉雅地带对贸易通道的考察、张延清副教授探讨的《普贤行愿经》及其经变在唐蕃古道和丝绸之路的传播、刘鹏副院长对藏传佛教在丝绸之路上的作用与地位的分析、杨锋博士在西藏阿里皮央、东嘎遗址的发掘与李帅博士在蕃尼古道的调查等，以最新的实地考察、考古资料或第一手的文献、档案资料着手，分享了新发现、新研究。

第二，对藏文文献中发现的新史料，或依据文献史料中对一些发生在高原丝绸之路上的古代历史文化现象作了精细地梳理和研究。主要有范德康教授对印度佛教文献评注里一些重要词素的研判、巴桑旺堆研究员对唐元明清不同时期汉藏通道走向的梳理、西热桑布教授利用“梵典宫”文献对贡塘地区的历史文化及传承的研究、齐德舜教授对宋

代吐蕃研究重要史料宋代笔记的研究以及古隆博士对尼泊尔古隆族人渊源的探讨等。

第三，明清时期藏地历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交通、军政机构等几个方面，呈现出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如罗布教授对清初西南边疆多元地方势力关系博弈的探讨、李志英博士从赋税入手对清代和硕特蒙古对康区管控的研究、朱娅玲博士对近代西方人对藏地交通状况的梳理和分析等。

第四，佛教的传播是高原丝绸之路上的最主要的历史文化现象之一，学者们从早期重要佛教写本的研究与流传、佛教重要文化现象的解读、佛教经典汇编的形成、佛教不同写本版本的研究和一些重要佛教派别的兴起等方面，作了大量而深入的研究。相关研究有：萨尔吉教授对大乘经典《宝星陀罗尼经》诸本的研究、拉巴次旦教授以“鲁”“龙”“那伽”三种不同术语为切入点分析藏汉印文化的交融与碰撞、旺多教授汉藏佛典经典《贤愚经》分析吐蕃时期的汉藏佛教交流、熊文彬教授从司徒一职的演变为例分析汉藏文化交流、张长虹研究员对汉藏交界地吐蕃时期大日如来造像的研究、欧珠次仁副研究员对梵文原典《亲友书》与藏汉译文的比较研究、杰夫·瓦特主任对如何辩认、分类与记录噶玛噶孜画派的研究以及玉珠措姆教授与剑桥大学海德噶·丁伯格(Hildegard Diemberger)教授合作从佛教文学作品中从“他者”的角度对“苯教徒”描述的研究等。

第五，此次会议邀请研究生参会，开设青年学者论坛，鼓励青年学子发表学术演讲，为他们搭建学术平台，提供与国内外一流学者学习交流的机会。这些青年学子的参与为会议注入了新鲜活力，他们大多有着良好的汉、藏、英多种语言基础，正接受着系统的学术训练，他们是未来研究的主力军和新兴力量。

综上，回顾近几十年来对高原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研究，是一个不断取得成就的历程，从此次会议中外学者在不同层面所展示出的坚持学术传统与发挥学术优势相结合、跨学科的交流与整合、多语言的研究等诸多研究方法与内容上的学术新气象来看，在未来的研究中，如果我们能够扬长补短，有关高原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考古艺术等方面的研究，必将取得新的高点。

◆ 赵靖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孙昭亮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